

新科技、新時代與新故事—— 上古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

■ 李修平

《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祖宗與軍事戰爭，對上古中國的統治者而言，乃是治國的首要任務。不論祭祀或戰爭，均使用特定物品：「祀」用容器，「戎」用兵器。當上古中國邁入青銅時代，作為當時最為尖端的高科技，鑄銅工藝隨即運用於製作容器與兵器。相對於莊重華麗的容器，攻城掠地的兵器，學界關注較少，且大多涉及類型與風格的分析。本文根據考古證據，概述目前所見上古中國十一類最早的青銅兵器。除了分析基本特徵，亦介紹其考古出土脈絡，兼論相關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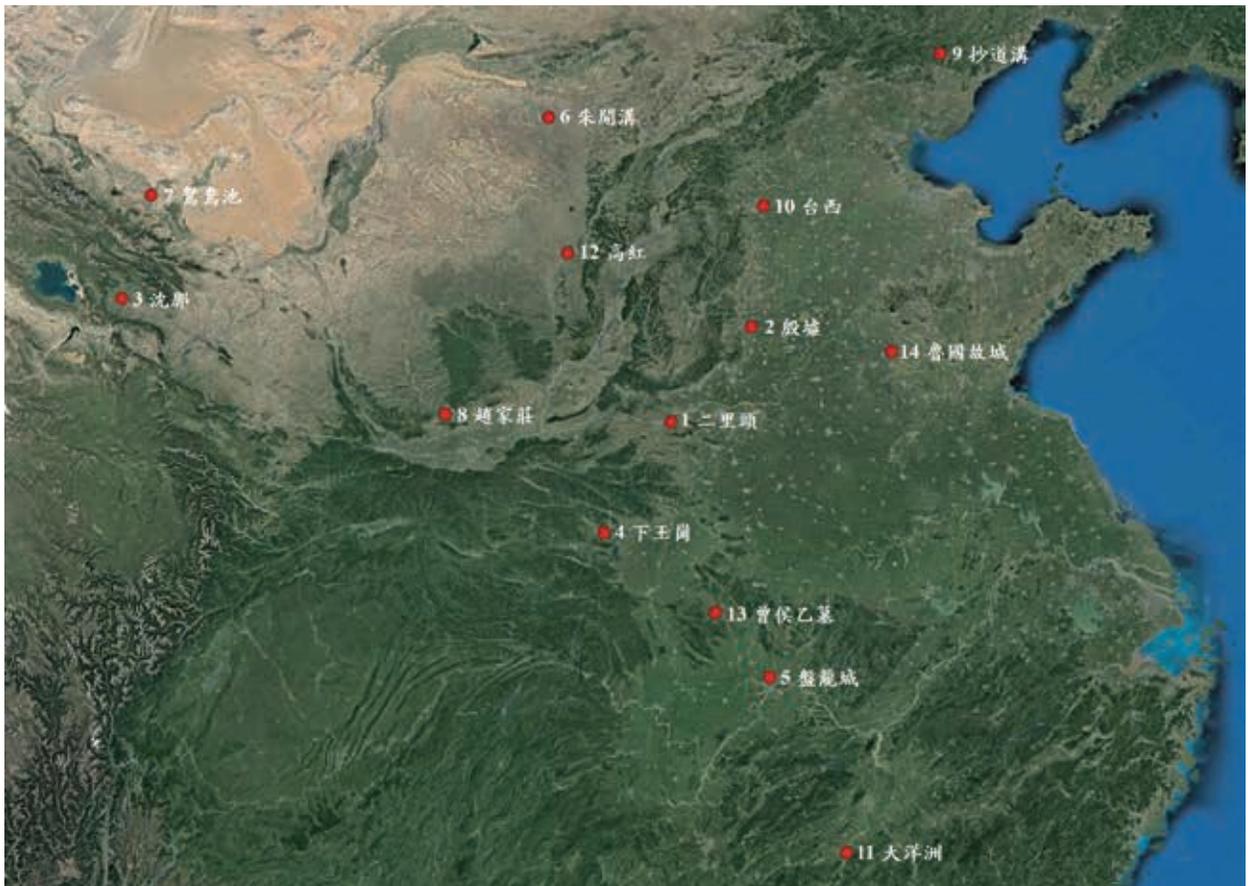


圖 1 上古中國出土各式最早青銅兵器遺址分布圖 作者據 Google Earth 製圖



圖2 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 HPKM1004 出土銅矛（由左至右：R006760:7；R006760:41；R006761:33；R006761:75） 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91，圖73。

新科技的誕生與運用

一八三六年，丹麥學者湯姆生（C. J. Thomsen, 1788-1865）根據科技演進的過程，提出人類文明變遷的三階段論——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今日，儘管考古學界對於湯氏之說有所修正，不過，「青銅時代」一詞早已深植人心。普羅大眾就算不清楚「青銅時代」的意涵，也應知是有別於「石器時代」的歷史階段。

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運用，受到生態環境與文化習俗等因素的限制。然而，就工藝的流變而言，青銅器的發明，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石器、陶器、木竹器、骨蚌貝器或織品等，雖各有製作訣竅，相對於鑄造青銅器，顯得樸實無華。鑄造銅器的流程，包括尋找礦源、開採礦石、冶煉礦料、製作鑄範、銅器澆鑄，與脫範打磨，各環節皆蘊含複雜的專業知識。因此，對於數千年前的古人來說，若說青銅鑄造是當時最尖端的「高科技」，實非誇飾。

上古中國曾歷經輝煌燦爛的青銅時代。本

文所論的上古中國，意指特定場域：時間縱貫早期舊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西元前五世紀至前三世紀）；空間包括以黃河與長江流域為核心的東亞大陸，並涵蓋周邊地區。在新石器時代，上古中國已出現銅製品，但數量稀少。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二里頭時代（西元前十八世紀至前十六世紀），也就是所謂的夏代晚期，上古中國正式邁入青銅時代。

《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上古中國，對統治者而言的頭等大事，對內是祭祀祖宗，對外是軍事戰爭。不論祭祀或戰爭，均使用特定物品：「祀」用容器，「戎」用兵器。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圖 1-1），即已應用鑄銅技術，製作容器與兵器。

當鑄銅技術運用於製作兵器後，人群間的武裝衝突，逐漸發生變化。這與青銅兵器的特性有關。一則，青銅兵器的殺傷力大幅提昇。相對於其它質材的武器，開刃的青銅兵器，只要劃破人體，輕則使人因傷喪失作戰能力，重則讓人因大量失血而死；二則，青銅兵器可以大量生產與回收重製。只要擁有足夠的原料，工匠可以同時鑄造多件青銅兵器，一經打磨開刃，即可使用。青銅兵器鈍化後，亦可透過打磨恢復鋒利。此外，即便青銅兵器損壞，仍可回收重鑄，再製新器。其它質材的兵器因其原料性質，無法兼具青銅兵器的工藝優點。

一九三〇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在河南安陽（圖 1-2）西北岡 HPKM1004 大墓內，發現大量青銅兵器，包括戈約七十件與矛約七百件。這批青銅兵器的形制與尺寸大致相同（圖 2），² 筆者認為，正是商代晚期青銅兵器大量生產的最好例證。

以下，本文將藉由考古證據，依時代順序，概述迄今所見上古中國各種最早的青銅兵器。

上古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

一、鏃

弓與箭，是人類最早發明的遠程武器之一，廣布全球。由於製作弓與箭的原料，多為容易分解的有機質材，因此，能歷經千萬年而保存至今者，主要是不易朽壞的箭頭，即「鏃」。最早的鏃為石、骨製成，發現於六、七萬年前的南非斯布都洞穴（Sibudu Cave）。在上古中國境內，至遲，在兩萬八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石鏃已見於山西峙峪。進入新石器時代，由石、骨、蚌、角、牙所製成的箭鏃，更是散見各地。

一般認為，最早的銅鏃發現於河南偃師二里頭。（圖 1-1）在該遺址三期（約西元前十七世紀末至前十六世紀初），至少已發現七件，除了造型古樸的棒形鏃（圖 3 右），亦已出現雙翼形鏃。³（圖 3 左）由於二里頭出土最早的銅鏃，均發現於地層與灰坑內，且鄰近製骨與



圖 3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銅鏃（左：II-V T119④：71；右：II-V H158：12）取自《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圖版 78-6、78-3。

鑄銅作坊，因此，銅鏃的分布地點，大概與銅鏃的生產消費有關。

附帶一提，在青海樂都柳灣，曾發現鍛造銅鏃，可能屬於齊家文化（約西元前二十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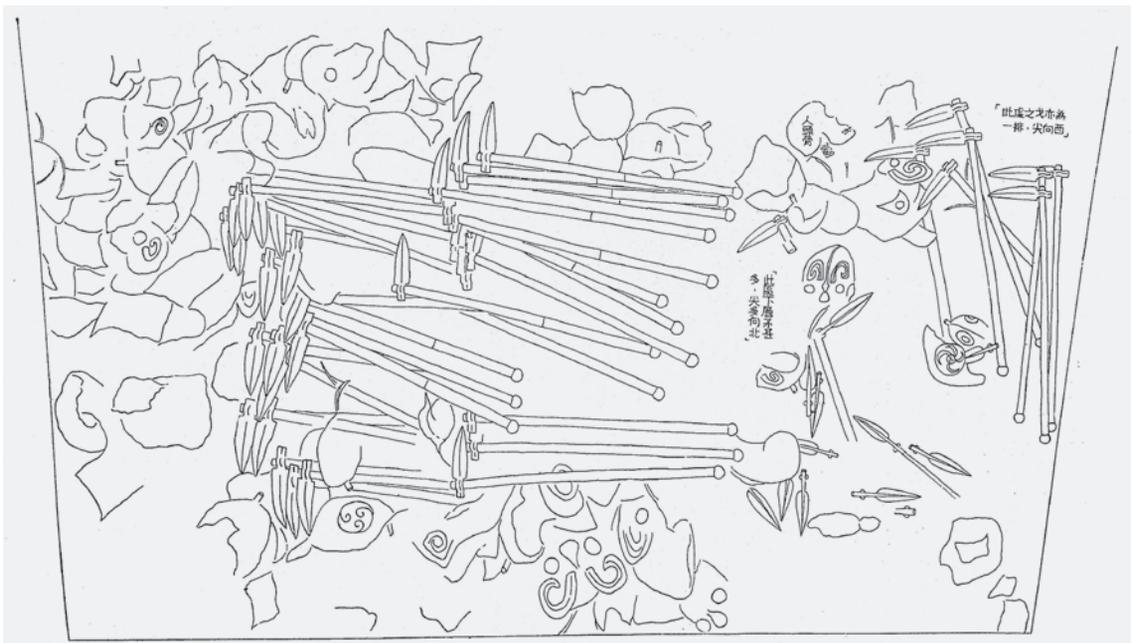


圖 4 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 HPKM1004 大墓銅戈木秘痕跡 取自梁思永、高去尋，《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五本·一〇〇四號大墓》，頁 34，插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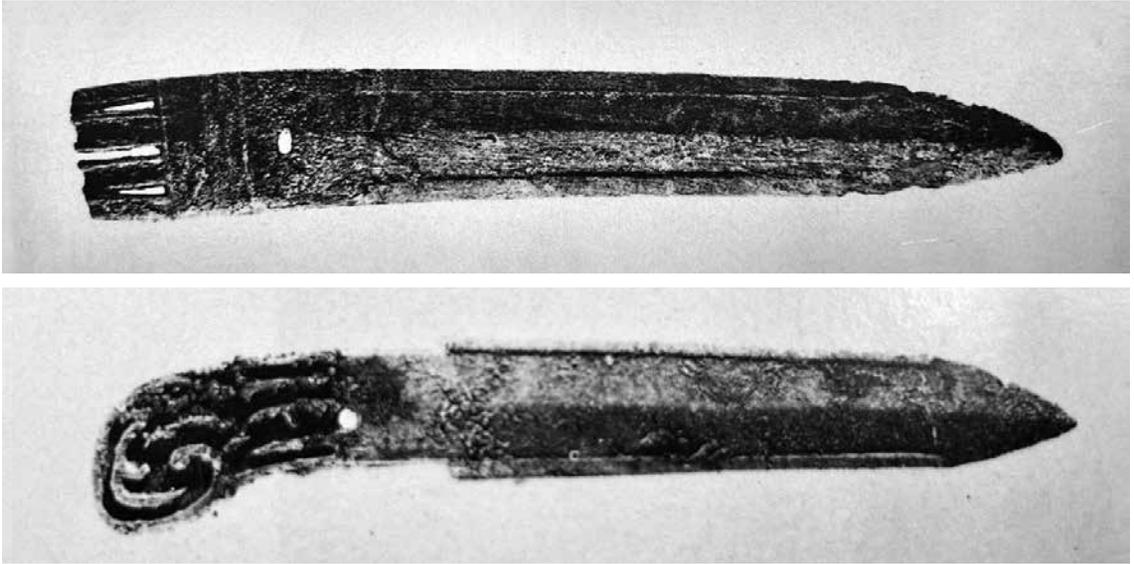


圖5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銅戈（上：III探：60；下：VI KM3：2） 取自《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圖版77-12、118-1。

紀至前十七世紀），年代可能早於二里頭，因此有學者認為，柳灣銅鏃的年代可能早於二里頭銅鏃。另外，在陝西神木石峁，亦曾出土有銜銅鏃，屬於朱開溝文化（約西元前十七世紀至十五世紀），年代與二里頭相當或略晚。⁴總之，上古中國最早的銅鏃究竟出現於何時何處，仍有討論空間。

二、戈

除了銅鏃，在二里頭遺址的三期，還發現上古中國最早的銅戈。相對於散見全球的鏃，銅戈是上古中國本地發明的兵器。銅戈的原型眾說紛紜，至少有「石斧說」、「狹長凸背石刀說」，與「石鏃說」，懸而未決。不過，在銅戈出現之前，於新石器時代末期陝西北部的石峁遺址，已率先出現玉戈。目前所見銅戈，大多僅存戈頭。至於安裝於戈頭之末、用於手持的木柄（即「秘」），大多腐朽無存。所幸，史語所早年在西北岡 HPKM1004 大墓，發現木秘痕跡，長約一公尺。（圖4）這項重要發現說明，至遲在商

代晚期，銅戈應是手持的近戰武器。在銅戈初見之二里頭，使用方式大概與晚商接近。

目前，在二里頭至少發現兩件完整的銅戈。一件為長條援直內戈（圖5上），採集品，埋藏情境不明。另一件是長條援曲內戈（圖5下），出土於高等級的墓葬中。可見，在上古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二里頭文化三期，大概僅有當時的菁英階層，才可隨葬青銅容器與兵器。換言之，在二里頭社會中，銅戈已成為體現擁有者身分地位的威望物品。

自二里崗文化時期（西元前十六世紀至前十四世紀）以降，直至東周時期（西元前七七一年至二二一年），上古中國出現五花八門、設計各異的銅戈，如有胡銅戈。（圖6）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後來設計的銅戈，均改良自二里頭的原型。

三、鉞

鉞是另一種已在二里頭出現的青銅兵器。銅鉞如同銅戈，使用時亦需裝柄，但其刃部則



圖 6 河南洛陽北窯出土有胡銅戈「太保菁戈」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5·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版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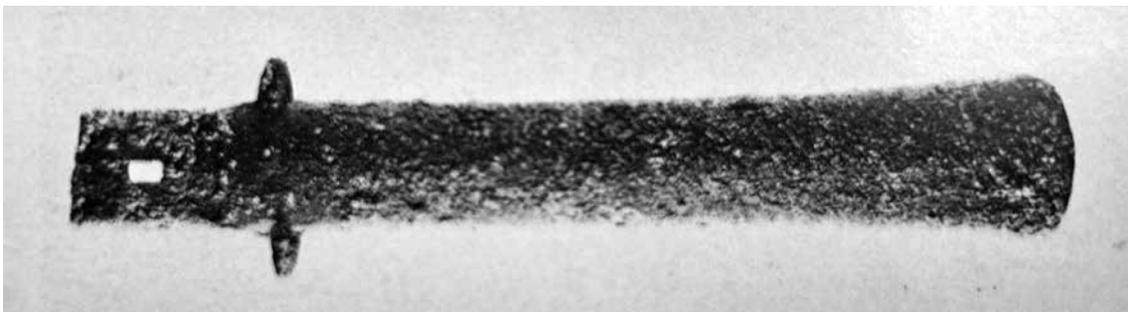


圖 7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銅鉞（VI KM3：1） 取自《偃師二里頭：1959 年～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圖版 1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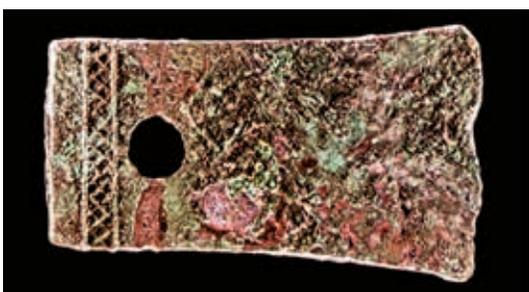


圖 8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銅鉞（2000III 探：1） 取自《二里頭：1999～2006》，彩版 281-4。

與木柄平行，因此，多採用劈砍的方式攻擊。在歷史文獻上，對於這種兵器，實有多種稱呼，除了鉞，亦稱斧、戚、斤、我。本文將這種兵器統稱為鉞。關於銅鉞的原型，可能源自新石

器時代的石斧。

迄今，二里頭出土兩件銅鉞。其中一件為窄長鉞。（圖 7）值得注意的是，這件銅鉞與前述的長條援直內銅戈（見圖 5 下），均隨葬於同一座墓葬，屬於二里頭文化三期，墓主身較高。另一件為寬體鉞（圖 8），⁵為採集品，出土脈絡不詳，因此無法依據埋藏情境，推測其功能與意義。

自二里崗文化時期起，銅鉞的數量逐漸增加，特別是在晚商的小屯文化⁶時期（西元前十三世紀至前十一世紀）。不過，晚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銅鉞，大多為寬體銅鉞，如婦好墓出土的大型銅鉞。⁷（圖 9）至於窄長鉞較少。

四、矛

除了在上古中國的「核心區域」——亦即黃河中游地區——發現鏃、戈、斧這三種最早的青銅兵器，在所謂的「周邊地區」，亦出土各式最早的銅製兵器。攻擊方式為向前突刺的矛，即為一例，特別是塞伊瑪—圖爾賓諾式的倒鉤銅矛。

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Seima-Trubino Culture）是一支歐亞草原東部重要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其年代上限為早於上古中國青銅時代的西元前三千紀之末，下限或與二里頭文化時期重疊。該文化興起於阿爾泰山，隨後向外擴張，文化因素亦傳入上古中國，倒鉤銅矛即為一例，目前已發現十三件，散見於青海、陝西、山西與河南。至於年代較早且具有明確出土地點者，其中一例（圖10左）見於青海西寧沈那（圖1-3），埋藏於灰坑，屬於齊家文化晚期；另外四例（圖10右）見於河南浙川下王崗（圖1-4），出土於灰坑，屬於龍山文化末期。⁸可見，若就沈

那與下王崗出土倒鉤銅矛的時代而言，可能與前述出土於二里頭的青銅兵器同時，甚至更早。

儘管塞伊瑪—圖爾賓諾式的倒鉤銅矛，是上古中國所見最早的銅矛，但矛骸（即管釜）帶倒鉤的設計，卻未被後世繼承。若不計倒鉤銅矛，長江中游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圖1-5），則出土上古中國最早的無倒鉤銅矛（圖11），發現高等級的墓葬之中，⁹年代等同於黃河中下游的二里崗文化上層一期（約西元前十四世紀前期）。

總之，不論是倒鉤銅矛，或盤龍城銅矛，上古中國最早的銅矛均發現於遠離「核心區域」之地。此一現象，耐人尋味。

五、劍

上古中國最早的銅劍，可能也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響的兵器。在西元前三千紀的西亞與中亞，即已出現設計成熟的金屬短劍。不過，遲至西元前兩千紀中葉，在今日內蒙古東部鄂



圖9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大銅鏃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商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188。



左圖10 倒鉤銅矛（左）青海西寧沈那 取自《青海文物》，封3；（右）河南浙川下王崗 取自高江濤，〈試論中國境內出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式倒鉤銅矛〉，《南方文物》，頁161，圖1-7。



右圖11 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銅矛 PLZM2:56 取自湖北省博物館編，《盤龍城：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47。



圖 12 內蒙古鄂爾多斯朱開溝出土銅劍 M1040：2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5·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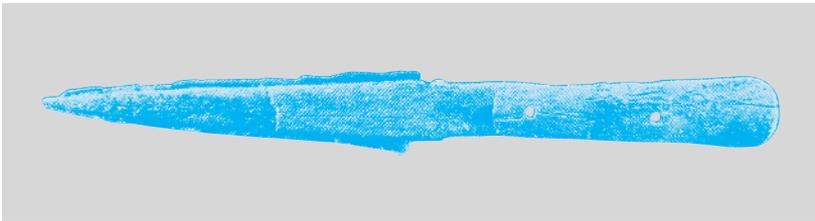


圖 13 甘肅永昌鴛鴦池出土骨柄石刃劍 取自〈永昌鴛鴦池新石器時代墓地的發掘〉，《考古》，圖版 5-1。



圖 14 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銅鉞（左：PWZH6：2；右：PYWM11：44） 取自《盤龍城：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頁 83、68。

爾多斯市的朱開溝（圖 1-6），才發現上古中國最早的銅劍。（圖 12）這件銅劍出土於墓葬，年代等同於黃河中下游的二里崗文化時期。該墓南部雖遭破壞，但仍發現兩具成人骨骼，右側的男性墓主，除隨葬銅劍一件，還有其他青銅兵器，¹⁰ 暗示該墓主應有作戰能力。

儘管西亞與中亞的金屬短劍，明顯早於朱開溝銅劍，不過，就器物風格而言，兩者相差甚遠；此外，當朱開溝銅劍出現時，在北方草原地區尚未發現類似的銅劍，但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北方的長城沿線，如屬於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的甘肅永昌鴛鴦池（圖 1-7），則出土造型相近的骨柄石刃劍（圖 13），¹¹ 據此，有學者推測朱開溝銅劍應源於長城地帶。

六、鉞

如前所見，上古中國最早的銅矛與銅劍，均發現於遠離黃河中下游的地區。有意思的是，

當時其實還存在另一種形制介於矛與劍之間的兵器：銅鉞，在戰國時代發現較多，不過，最早已見於長江中游的盤龍城。銅鉞的造型類似銅劍，但與銅矛相同皆安裝長秘，因此可向前突刺與橫向砍劈。

盤龍城共發現銅鉞兩件（圖 14），但出土脈絡與年代有別。¹² 其中一件發現於盤龍城城址以南的王家嘴「祭祀坑」，年代較早，為黃河中下游的二里崗文化上層二期（西元前十四世紀後期）。另一件則出土於城址西北部楊家灣的高等級墓葬中，年代偏晚，已進入黃河中游的涇北花園莊期（西元前十四世紀末葉至西元前十三世紀中期），此時盤龍城城址已經廢棄，整個遺址的中心地區即在楊家灣一帶。

關於盤龍城出土的銅鉞，有兩個問題，值得未來探索。首先，學者認為，由於盤龍城銅鉞與前述朱開溝銅劍的形制近似，因此，前者

可能是自後者發展而來。不過，因兩地距離極遠，此說或有待商榷。其次，根據現有證據，無論是無倒鉤銅矛或銅鉞，這兩類用於突刺的青銅兵器，最早均發現於長江中游的盤龍城。令人好奇的是，這個現象是考古發現的偶然巧合？還是歷史情境的真實反映？

七、刀

相對於前述六類青銅兵器，銅刀的性質與設計多元複雜。上古中國至晚在龍山時代末期至二里頭文化早期（約西元前二十三世紀至前十八世紀），即已出現銅刀。然而，此時的銅刀大多尺寸較小，體量輕薄，而且隨著時代發展，形制變化多端，可能為工具。上古中國究竟何時出現作為兵器的銅刀？又有哪些種類？學者意見分歧。極端的意見甚至認為，上古中國根本不存在

可用於戰爭中砍殺的銅刀。也有些學者指出，根據現有考古證據，作為兵器的銅刀，最早大概出現於二里頭，不過此說也有爭議。參考各種意見後，本節將聚焦於一般所認定作為武器的銅刀，包括脊背刀、卷首刀與獸首刀。

脊背刀的特徵是前鋒上翹，背凹，刃寬，身長，柄短。年代較早的脊背刀（圖 15），見於河北藁城台西墓葬（圖 1-10），可定於河北花園莊期。隨葬銅刀的墓主，多為當地菁英，在墓中除了發現銅器、玉器、漆器等威望物品，多有殉人與殉狗。此外，較早的脊背刀亦見於湖北黃陂盤龍城，但刀身細長。¹³ 其後，脊背刀亦大量流行於河南安陽殷墟，不過，當地的脊背刀有些刀背另飾有鏤空的稜脊，如婦好墓銅脊背刀。（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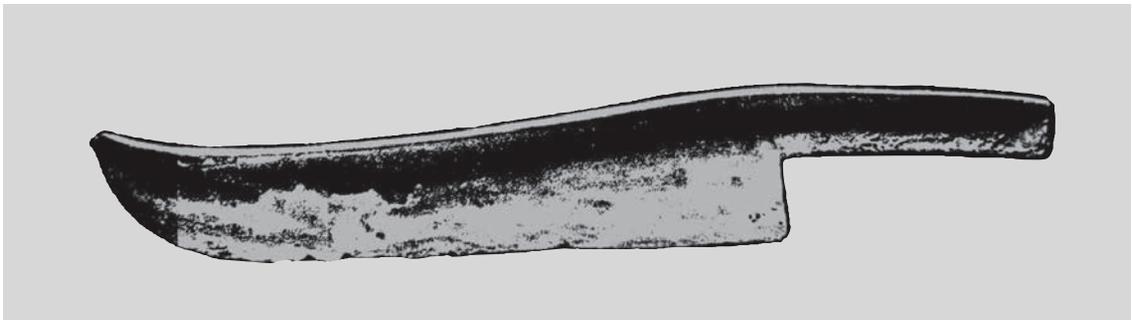


圖 15 河北藁城台西出土銅脊背刀 M112：10 取自《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圖版 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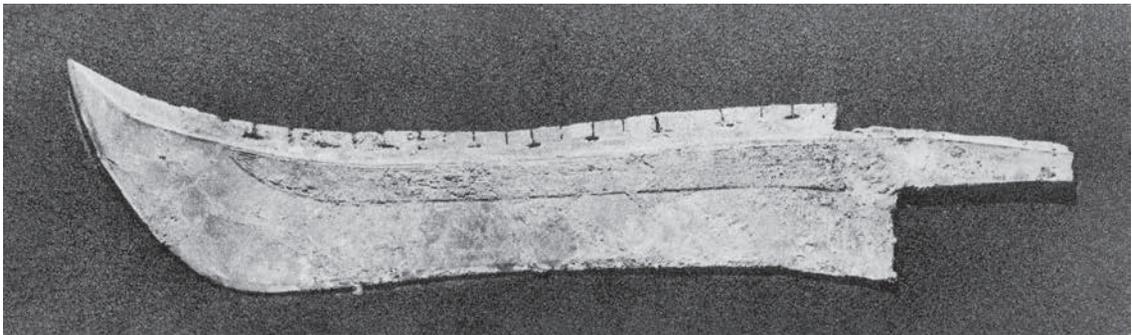


圖 16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銅脊背刀 M5：1169 取自《殷虛婦好墓》，圖版 65-1。



圖 17 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銅卷首刀 PYWM11：7 取自李桃元、何昌義、張漢軍編著，《盤龍城青銅文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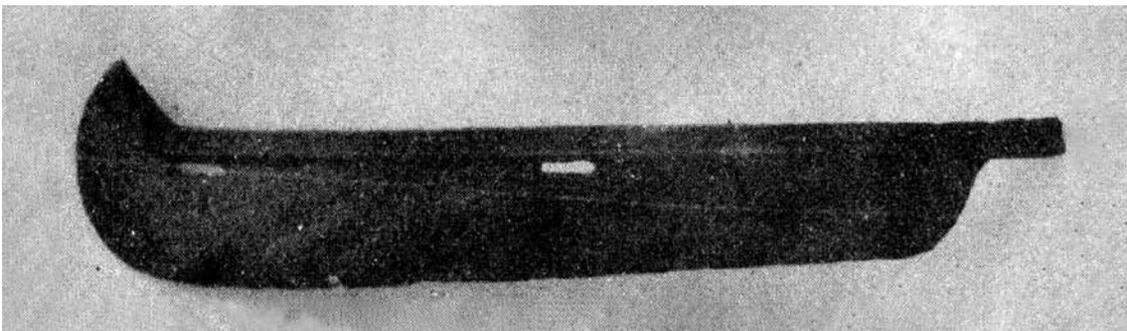


圖 18 陝西淳化趙家莊 CHZHM1 出土銅卷首刀 取自姚生民，〈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頁 13，圖 1-3。



圖 19 河南安陽殷墟西區墓地 M1713 出土銅卷首刀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商3》，圖版 199。

卷首刀的造型十分特殊，刀身頂端呈卷曲狀，木柄安裝於刀背，可能是長兵器。目前所知最早的卷首刀，亦發現於盤龍城。在前述楊家灣的高等級墓葬中，除了隨葬銅鉞，另出土兩件相同的卷首刀。（圖 17）類似的卷首刀，亦見於上古中國的「周邊地區」，如出土於陝西淳化趙

家莊（圖 1-8）的墓葬，但刀身較寬（圖 18），時代應略晚於楊家灣卷首刀。除了刀背有穿孔的卷首刀，亦見刀背帶管鑿者。在河南安陽殷墟西區墓地，便出土兩件相同的管鑿卷首刀。（圖 19）該墓隨葬品豐富，年代較晚，屬晚商小屯文化四期（西元前十一世紀前期）。學者推



圖 20 安徽潛山薛家崗出土石多孔刀 M44:11 取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潛山薛家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彩版 14。



圖 21 山西石樓義牒出土銅三鑿刀 取自韓炳華主編，《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383，圖 618。

論，盤龍城的卷首刀可能源自新石器時代的長方形多孔玉石刀。（圖 20）此外，殷墟西區出土的管鑿卷首刀，則是融合以盤龍城卷首刀為代表的「中原」風格，以及以山西石樓義牒出土的三鑿刀¹⁴（圖 21）為代表的「北方青銅文化系統」，所發展而成的青銅兵器。

最後，所謂的獸首刀，指的是柄末做成獸

頭造型的銅刀，如河北青龍抄道溝（圖 1-9）的鹿首刀。¹⁵（圖 22）這種設計特殊的銅刀，大概出現於等同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小屯文化時期，主要分布兩個地區，其一是整個北方地帶，東起遼西、西到新疆、北至外貝加爾地區；其二則是殷墟。由於獸首刀具有明顯的草原風格，而燕山南北的數量與種類最多，因此，學者推論獸首刀即源於此地。儘管獸首刀起源於北方地帶為學界的主流意見，不過，因考古材料的限制，北方地帶獸首刀的年代，只能大致定在中原地區的晚商時期。相較之下，殷墟獸首刀的年代比較明確。例如，婦好墓的鹿首刀（圖 23），可定於小屯文化大司空村二期（西元前十二世紀前期）。殷墟的獸首刀除了可能包括輸入自北方地帶的「舶來品」，還包括本地製品，如史語所早年在小屯 20 號車馬坑出土的羊首刀、馬首刀，與牛首刀。（圖 24）由於這三件銅刀的獸首帶有明顯的殷墟風格，特別是羊首與牛首，故應為殷墟工匠所製。



圖 22 河北青龍抄道溝出土銅鹿首刀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5·北方民族》，圖版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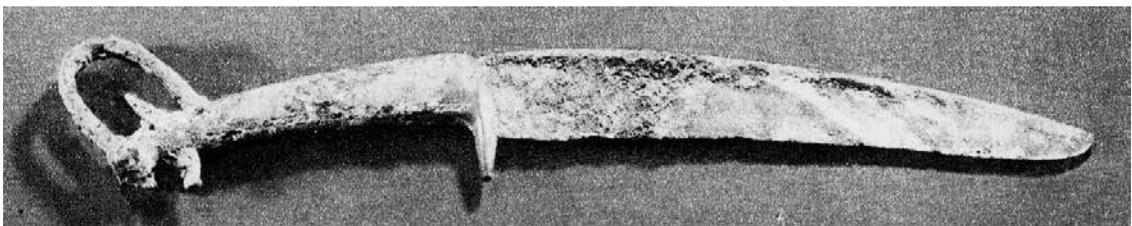


圖 23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銅鹿首刀 M5:690 取自《殷墟婦好墓》，圖版 66-1。

八、戟

戟是由戈與矛組合而成的兵器，既可突刺，又可劈砍、勾割。根據考古發現，學者將「戟」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分體戟，即將戈頭與矛頭分開鑄造後，再組裝為一。第二類為合體戟，即將戈頭與矛頭或捲首刀，渾鑄為一體而成的兵器。這兩類銅戟均出現於中原視角下的商代，不過，各僅一件。

迄今，上古中國所見最早的銅戟，發現於河北藁城台西（圖 1-10）的墓葬（圖 25），為分體戟，¹⁶ 年代大致等同於涇北花園莊期。由於該墓隨葬較多兵器，推測墓主應具有作戰能力。另一件銅戟發現於江西新贛大洋洲（圖 1-11）大墓，鄰近長江中游的支流贛江。墓主應是當地的統治菁英，隨葬品極其豐富，以銅器、玉器、陶器為主，約有一千九百件，其中包括大量青銅兵器，銅戟（圖 26）即為其中之一，為合體戟。¹⁷ 本墓的隨葬器物內容複雜，年代最早者等同於黃河中下游的二里崗文化時期，最晚者已經進入小屯文化大司空村期（西元前十三世紀中至十一世紀中）。據此，銅戟的年代應



圖 24 河南安陽殷墟小屯 20 號車馬坑出土銅獸首刀（由右到左：羊首刀 R001587、牛首刀 R001589、馬首刀 R001588） 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頁 96，圖 81。



圖 25 河北藁城台西出土銅分體戟 M17：5 取自《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圖版 90-5。



圖 26 江西新贛大洋洲大墓出土銅合體戟 XDM：133 取自江西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編，《江西新贛出土青銅藝術：長江中游青銅王國》，香港：兩不出版社，1994，圖版 43。

不會晚於本墓的年代下限。

有意思的是，進入西周時期（西元前十一世紀中葉至前七七一年），上古中國的銅戟數量大增，不過，幾乎都是與新贛大墓類似的合體戟，而非台西所見的分體戟，後者僅見於距離黃河中下游地區非常遙遠的西南地區。不過，到了東周時期，合體戟幾乎絕跡，僅見分體戟。

九、盔

前面討論的都是攻擊型的武器，此處則談防禦用的武器：盔，或稱冑，不過這類銅器的數量較少。迄今所見最早的銅盔，出土於西北岡 HPKM1004 大墓內，應有一百餘件，為全罩式。在頭盔正面額頭以上，飾以設計不一、繁簡不同的浮雕獸面紋，頂部有豎管，或可插飾羽毛（圖 27），年代為小屯文化大司空村二期。除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大致同時期的北方地帶，如屬於李家崖文化的山西柳林高紅（圖 1-12）的墓葬中，亦發現銅盔（圖 28），不過尺寸較小，僅蓋住頭顱及耳部，未完整包覆頸部。除了銅盔外，該墓還出土其他的青銅武器，¹⁸ 據此可知墓主應具備作戰能力。

儘管在以殷墟為代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與以高紅為代表的北方地帶，兩地均發現銅盔，而且時代可能接近，但由於殷墟盔與高紅盔的風格有別，前者為有中脊帶獸面紋，後者圓頂光素，究竟是獨立發展或是單邊影響的結果，目前無法遽下定論。另外，關於歐亞草原銅盔的起源，曾是學界爭論的焦點。然而，根據目前證據，上古中國境內的銅盔，不論是中原地區，抑或北方地帶，均早於歐亞草原的其它地區。

十、殳

以上的青銅兵器，至遲在西元前第二千紀末葉，均已出現於上古中國。進入東周以後，



圖 27 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 HPKM1004 出土銅盔 R015337 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頁 86，圖 70 左。



圖 28 山西柳林高紅出土銅盔 取自韓炳華主編，《晉西商代青銅器》，頁 111，圖 126。

仍發明新的青銅兵器，但是種類較少，其中之一為銅殳。根據文獻記載，關於殳的形制，實有兩種說法。第一，殳是一種有刃、類似矛的兵器。第二，殳是一種無刃的器具，似杖，功能是當馬車行進於道路時，護衛持之，用以區隔車與人。筆者認為，後者並非兵器，是故此處只論有刃銅殳。

目前所見最早的有刃銅殳，發現於湖北隨州（圖 1-13）的曾侯乙墓。該墓墓主為戰國早期的曾國國君，隨葬品十分驚人，有一萬五千餘件，僅銅器就有六千餘件。根據設計之別，該墓出土的銅殳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無刺殳，共六件（圖 29 左），出土時安裝在長三公尺以上的髹漆積竹木柶上。第二類為帶刺殳，僅一件（圖 29 右），下亦接長木柶。¹⁹

《周禮·夏官·司兵》：「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根據文獻記載，銅殳應是上古中國常見的兵器之一。不過，在考古發現中，有刃銅殳不但出現極晚，而且非常罕見。因此，傳世文獻將殳視為「五兵」之一，是否是漢人的想像？又或者文獻中的殳，不僅指曾侯乙墓出土的「殳」，其實還另指他物？抑或有其它的可能性？

十一、弩機

最後要談的青銅兵器是弩機。如本文開頭所提，弓與箭是人類歷史上發明最早的遠程武器之一，而弩則是由弓發展而成的射擊兵器，現在稱為十字弓。這種兵器最早見於上古中國，學者推測在新石器時代即已出現；然而，根據文獻記載，弩可能是春秋晚期楚人的發明。筆者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或許大些。

弩的構造，包括三個部分，即弩機、木臂，與弓身。（圖 30 左）（1）弩機為發射器，又可分为牙、望山、懸刀、機塞，與樞軸（圖 30 右）：牙可勾弓弦；望山與牙一體，位於牙後，為瞄準器；懸刀為扳機；機塞置於牙前，是連接上方的望山與牙以及下方懸刀的裝置；樞軸則為樞心，將上方的望山與牙，以及下方的懸刀，組合為一體。（2）木臂的後端挖槽，安裝弩機，上方安置箭桿，下方以手承托。（3）弓身橫架於木臂前端，弓弦搭於弩機上方的牙。

儘管弩大概出現於春秋晚期，不過最早的弩機應為木製。根據現有的考古證據，可能直到戰國早期，才發展出銅弩機。在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圖 1-14）就出土兩件銅弩機（圖 31），基本構造一應俱全。²⁰ 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銅弩機的墓葬雖然被盜，但仍出土大量精美的隨葬品，而且武器不少，說明墓主人的身分較高，而且是具有作戰能力的貴族。



圖 29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銅殳（左：N.290；右：N.153）
左圖取自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戰國早期的禮樂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19；右圖取自湖北省博物館編著，《曾侯乙墓》，彩版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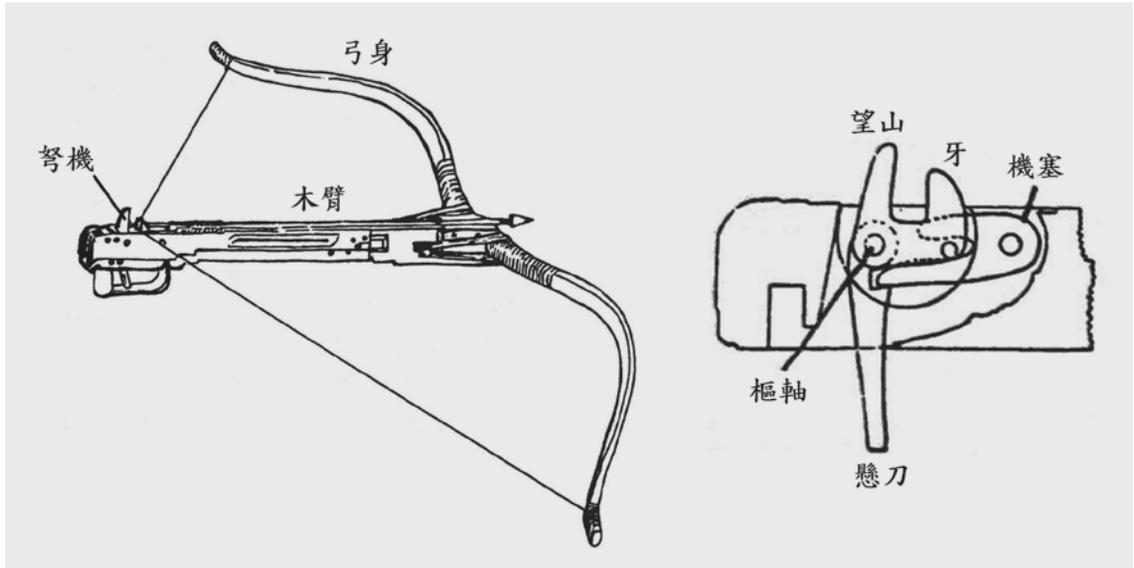


圖 30 弩（左）與弩機（右）各部位名稱示意圖 修改自朱鳳翥，《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428，插圖 4·22-3、4·22-2。

青銅兵器蘊含的大歷史

當上古中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在西元前兩千紀上半葉進入青銅時代後，青銅鑄造工藝隨即運用於兵器的製作。由於青銅兵器具有大量製造、回收重鑄、鋒利耐用的特性，而且殺傷力強，因此，青銅兵器的發明與廣泛運用，逐漸改變戰爭型態。本文根據考古證據，概述十一種上古中國所見最早青銅兵器的型態特徵、考

古脈絡與相關問題。以下簡述本文發現。

首先，上古中國最早出現的青銅兵器，包括鏃、戈與鉞，均發現於上古中國的「核心區域」，亦即位於黃河中游的二里頭遺址，均屬三期，銅戈更成為上古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青銅兵器，直到戰國時期，仍廣泛運用於戰場之上。

其次，在等同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小屯文化大司空村期——也就是晚商時期——之前，陸續出現六種青銅兵器，包括攻擊用的矛、劍、鉞、刀、戟，與防禦用的盔。有別於二里頭文化時期，這個階段所出現各式最早的青銅兵器，大多發現於上古中國的「邊緣區域」，卻隨著時代發展，有些器類逐漸流行於各地，特別是矛、劍與戟，並與前一個階段已出現的鏃與戈，在東周時期，共同成為當時列國相互攻伐的主要兵器。最好的例證，就是在史語所早年於河南汲縣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鑑（圖 32）上，不但描繪兩千多年前的戰爭場景，還包括當時戰士使用的武器，即戈、矛、戟、劍、弓（包括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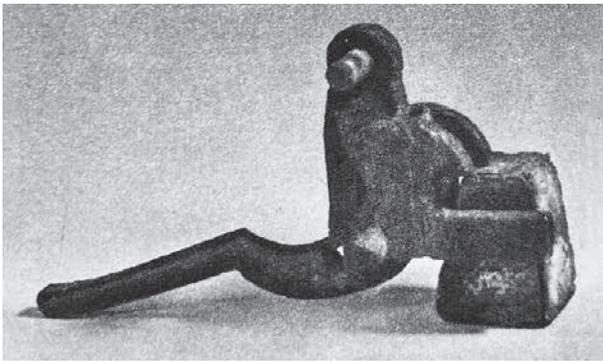


圖 31 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出土銅弩機 M3：61 取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編，《曲阜魯國故城》，圖版 85-6。



圖 32 河南汲縣山彪鎮 1 號墓出土水陸攻戰紋銅鑑（上）與部分戰爭場景紋飾（下） 取自杜正勝主編，《來自碧落與黃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93，圖 79。

最後，進入戰爭頻仍的東周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之際，新的青銅兵器持續發明，至少包括弩與弩機。前者似乎流傳不廣；但後者卻與弓相同，成為日後人類歷史上常見的遠程武器，直到熱兵器的發明，才淡出於戰場之上。

戰爭，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無法消除之惡，而兵器則是自我保護與施行暴力的有效工

具，古今無異。人類透過歷史文獻，甚至文物圖像，試圖保存戰爭的點點滴滴，或為歌頌我族的光榮，或為批判他者的惡行。至於自衛或施暴的兵器，特別是考古發現的材料，由於出土脈絡絕大多數與戰爭無涉，而且戰爭毫無保留地展現人性之惡，因此，兵器作為暴力工具的本質，遂在學術研究中隱而不彰。關於上古

中國青銅兵器的研究，過去，多聚焦於發明起源、形制流變、功能設計，乃至外來影響；此外，偶見關注其象徵意義，以及背後所涉及不同區域的互動關係。然而，無可諱言，關於後者的研究，特別是兵器所展現多元的功能、價

值與意義，仍有待深化。

最後，筆者以為，將上古中國的青銅兵器，設法置回其原始的時空脈絡，才有可能在歷史情境中，更加準確地挖掘人性的複雜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註釋：

1. 本文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三年期計畫「上古中國的青銅兵器、考古脈絡與區域互動」(NSTC 112-2410-H-001-076-MY3)之部分研究成果。必須說明的是至遲到了商代晚期，上古中國已經出現了馬車，隨後也運用於戰場之上，就廣義而言，也可算做「兵器」。不過，由於馬車與銅製車馬器為專門的研究範疇，礙於篇幅，本文僅限於討論人身配戴的青銅兵器。
2. 梁思永、高去尋，《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五本·一〇〇四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頁145-146、154-155。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頁169-171。
4. 蕭永明，〈樂都縣柳灣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遺址〉，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200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394-395；陳坤龍、楊帆、梅建軍、邵安定、邵晶、邱楠，〈陝西神木市石峁遺址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及相關問題〉，《考古》，2022年7期，頁58-70。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頁241、24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207。
6. 目前，學界大多稱發掘於安陽且屬於晚商的考古學文化為「殷墟文化」。不過，由於史語所前輩學者在發掘之初，稱為「小屯文化」，符合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因此，本文採傳統說法。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虛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05。
8. 王國道，〈西寧市沈那齊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260-261；青海文物編輯部，《青海文物》，總8期(1994)，封三：1；高江濤，〈試論中國境內出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式倒鉤銅矛〉，《南方文物》，2015年4期，頁161、164-165。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盤龍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52-156、177。
10.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編著，《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221、235。
11.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武威地區文物普查隊，〈永昌鴛鴦池新石器時代墓地的發掘〉，《考古》，1974年5期，頁304。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盤龍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頁126、135、263-266、292。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35、161-16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盤龍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頁176-179、135。
14. 姚生民，〈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年5期，頁2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西區一七一三號墓的發掘〉，《考古》，1986年8期，頁703-712、72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石樓縣二郎坡出土商周銅器〉，《文物》，1958年1期，頁36；石樓縣文化館，〈山西石樓義牒發現商代銅器〉，《考古》，1972年4期，頁29。另，三鏃刀亦見於陝西，如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93，圖97。
1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青龍縣抄道溝發現一批青銅器〉，《考古》，1962年12期，頁644。
1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藁城台西商代遺址》，頁134、162。
1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贛縣博物館，《新贛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99。
18. 楊紹舜，〈山西柳林縣高紅發現商代銅器〉，《考古》，1981年3期，頁211。
19. 湖北省博物館編著，《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93-294。
2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編，《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頁154-155。